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与未来展望

孙久文 李坚未

(中国人民大学 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72)

[摘要]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已经中央批准实施,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其区域合作发展潜力与京津冀发展现实之间的差距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讨论和研究。本文从区域发展差距、产业发展状况、科技与政府合作等四个方面讨论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因素,得出了市场经济发展不成熟、三省市政治地位不平等、中央政府相关制度设计缺失和三省市缺乏统一的规划系制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根本原因,最后提出培育市场主体、统一京津冀产业发展规划和创新性改变公共服务政策和财税政策的措施。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市场主体;统一规划

[作者简介]孙久文(1956—),男,北京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研究。

李坚未(1987—),男,陕西省咸阳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读博士,主攻区域发展与区域理论。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5)04-0137-06 [收稿日期]2015-04-20

一、导言

2015年3月23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审议研究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共中央政治局2015年4月30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该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

2013年,京津冀地区以约全国2.3%的土地面积承载了全国7.9%的人口,生产了全国约11%的GDP。但京津冀地区作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第三极,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2013年京津冀GDP仅为“长三角”的57%,京津冀协同发展效应较“长三角”和“珠三角”弱已成为业界和学术界的共识。1990年代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的开发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并成为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2013年“长三角”地区以占全国约2%的土地面积,11.6%的人口,生产了20.8%的GDP。然而,京津冀地区的综合优势要远远超过“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1]。同时,京津冀内部也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所作《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指出,“河北省与京津接

壤的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形成了“环京津贫困带”,“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京津冀发展整体差距和内部差距都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京津冀区域合作发展的潜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发达富裕的京津与相对落后的河北的矛盾、北京和天津经济发展定位重叠的矛盾、京津对环境的敏感与河北重化工及能源消耗的经济结构的矛盾和京津的虹吸效应与河北生产要素短缺的矛盾,已经引起全社会广泛的关注。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可以缓解北京大城市病问题,解决北京和天津发展遇到的资源及空间不足问题。通过京津冀区域统一市场的构建,实现区域内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带动河北经济增长并实现增长质量的提高,促进京津冀一体化的实现和京津冀综合优势的有效发挥,构建以京津冀增长极为基础的环渤海经济带,完成由京津冀带动北方经济发展的使命,最终发展起来围绕北京和天津的世界级城市群。展望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方式,跨行政区域的合作势必成为经济增长新的潜在推动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样本也可以为其他地区的区域合作提供经验借鉴。

二、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因素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推动实施协同发展战略的总体方针已经明确。根据国家的统一

部署 交通、生态环保和产业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的三个主要领域。然而 制约京津冀协同的因素很多 本文主要从收入、产业、科技和政策环境角度来探讨分析。

(一) 京津冀三省市发展差距

京津冀三地发展差距较大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三地经济发展差距太大。2013 年 ,北京人均 GDP 为 93231 元 天津为 99607 元 均达到了世界银行认定的富裕国家的水平 分别为河北的 2.4 和 2.6 倍。京津和河北人均 GDP 绝对值的长期扩大 导致了京津两地对河北的“虹吸效应” 促使河北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产业向京津两地流动 形成了“环京津贫困带”和三省市经济非均衡化的发展态势。根据统计显示 2013 年 北京和天津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40321 元、32657.95 元 分别超过河北 18094.25 元和 10431.2 元。京津和河北的收入差距促使生产要素向京津两地集中 加剧了三地发展的不均衡。此外 京津冀三地在科技文卫等公共服务投资方面也存在分布不均衡。根据 2013 年三地统计年鉴 京津两地的人均财政支出^①分别为 28557 元和 17670 元 分别为河北的 4.7 倍和 3.3 倍。京津两地尤其是北京聚集了全国大量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 这对全国的要素都有很强大吸引力 ,遑论河北 河北生产要素的单向流动 形成了北京要素资源充足和河北要素资源短缺现象。

京津冀三地在收入水平、公共服务和教育等方面

表 1 2013 年北京、天津、河北规模以上工业产业产值前十位的行业

序号	北 京		天 津		河 北	
	产业名称	产值(亿)	产业名称	产值(亿)	产业名称	产值(亿)
1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3739.13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4085.76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1974.36
2	汽车制造业	3269.25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040.47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869.04
3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217.01	汽车制造业	1843.15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2704.51
4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767.19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488.16	金属制造业	2439.38
5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714.06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1378.92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377.01
6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713.18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1299.08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2126.50
7	专用设备制造业	614.67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1293.48	农副食品加工业	2088.36
8	医药制造业	599.15	专用设备制造业	1181.7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936.79
9	通用设备制造业	516.93	金属制品业	1156.41	汽车制造业	1796.93
1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491.05	食品制造业	1128.39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760.14

数据来源 《北京市统计年鉴 2014》、《天津市统计年鉴 2014》、《河北省统计年鉴 2014》

^①该指标为 2013 年本地财政支出除以本地常住人口。

的巨大差距 使京津冀地区形成了核心边缘格局 核心区通过要素聚集形成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 通过循环累积效应 聚集区极化现象进一步得到加强 三地经济社会发展鸿沟越来越大 京津冀发展非均衡格局加剧 ,最终形成了“北京吃不下、天津吃不饱、河北吃不着”的局面。随着聚集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一般而言 聚集区的极化效应慢慢会弱于扩散效应。然而 北京自身的经济、公共服务、教育等方面的巨大优势 使本地要素资源产生固性 而这仅仅依靠市场是无法消除的。

(二) 产业发展状况

1. 区域发展阶段

2013 年 ,北京第三产业占比为 76.9% ,“三、二、一”产业结构标志着北京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而天津和河北均处于工业化阶段。2013 年 天津第二产业占比为 50.6% 低于河北的 52.2% 但天津的第三产业比值为 48.1% 高于河北的 35.5%。从三地产业结构对比情况来看 京津冀存在明显的产业梯度 京津处于高梯度 河北梯度较低 京津冀存在产业梯度转移的经济基础。

2. 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状况

从 2013 京津冀规模以上工业产业产值前十位的行业(见表 1) 和京津冀工业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见表 2) 可以看出 北京与天津、天津与河北存在产业同构现象。在工业产值前十位的行业中 京津两地有五类行业是相同的 京冀有四类行业是相同的 津冀有五类行业

相同。从京津冀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来看,京津与津冀存在产业同构现象,且津冀两地均处于工业化阶段,津冀同构现象严重,两地竞争大于协作;京冀两地系数较小,合作潜力较大。

表 2 2013 年北京、天津、河北工业产业结构相似系数^①

	北京与天津	北京与河北	天津与河北
相似系数	0.58	0.36	0.80

表 3 2013 年北京、天津、河北区位商大于 1 的行业^②

序号	北京		天津		河北	
	行业	区位商	行业	区位商	行业	区位商
1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6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2.8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1.8
2	汽车制造业	2.5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8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4
3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0	食品制造业	1.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4
4	医药制造业	1.8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4	金属制造业	1.2
5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1	专用设备制造业	1.3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2
6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1.1	农副食品加工业	1.2
7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1.1		

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年鉴 2013》、《天津市统计年鉴 2013》、《河北省统计年鉴 2013》

从上表 3 可以看出,北京优势产业主要分布在生产服务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现代制造业,处在产业链条的高端;天津优势产业主要集中在装备制造业和现代制造业,处在产业链条中端;而河北的优势产业主要为高耗能、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处于产业链条的末端。结合表 1、表 2 和表 3,可以看出,京津和津冀优势产业重合度高,京冀优势产业重合度较小,京冀产业梯度差大于京津产业梯度差。但是,京冀也存在产业的相互依赖性和上下游关联较少的问题,无法通过产业关联、产业协作、产业融合而达到利益互惠,三地之间共同产业利益基础缺失。

(三) 科技

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基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然而创新根本上是科技人才的创新,京津冀科技资源分布存在严重不均衡的现象,这主要体现在教育和科研活动层面上。北京总共有 91 所大学,其中 211 大学有 26 所;天津有 55 所大学,211 高校有 4 所;河北仅有 1 所 211 大学,教育资源严重匮乏。根据 2014 年全国及地区科技进步统计监测结果显示,北京和天津的综合科技进步指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 83.12% 和 78.63%,分列第一、四位,河北综合科技进步指数为 41.78%,列第 25 位;科技进步环境指数中,北京和天津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 88.06% 和 86.69%,分列第一、二位,而河北仅为 44.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列第 25 位;北京和天津的科技投入活动指标分别为 75.54% 和 76.1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65.59%,分列第六、五位,而河北为 46.35%,列第 19 位;在科技活动产出指数中,北京为 100%,列第一,天津为 86.86%,列第三位,河北为 18.75%,列第 26 位;在

高新技术产业化评价指标中,北京、天津分别为 77.37% 和 82.69%,分列第二位和第一位,河北为 32.75%,列第 28 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北京和天津的科技促进社会发展指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64.99%,分别为 77.66% 和 67.2%,分列第二、八位,河北为 59.61%,列第 22 位^③。

(四) 政府合作

下表 4 为 2015 年京津冀地区规划要大力发展的产业,北京和天津均将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列为重点发展的产业,规划发展行业完全相同,可以想象北京和天津将会在该产业发展中展开激烈的竞争,大规模重复建设、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的现象必然发生;河北省重点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与京津两地竞争不大,也为承接京津两地产业转移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表 4 2015 年北京、天津和河北规划重点发展行业

	规划重点发展行业
北京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
天津	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
河北	现代物流、商务会展、金融保险、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文化旅游、健康养老

数据来源:2015 年北京、天津和河北政府工作报告

京津冀三地政府均在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均多次提到京津冀协同发展概念,亦均明确交通、生态环保和产业是协同发展首先推进的领域,但三方对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利益诉求存在一定差别。北京希望通过疏解动物园地区批发市场、大红门地区批发市

①数据是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 2014》、《天津市统计年鉴 2014》、《河北省统计年鉴 2014》中规模以上工业行业总产值计算得来。

②本表列出的是三地工业产值列前十行业中区位商大于 1 的行业。

③数据来源:2014 年全国及各地区科技进步统计检测结果。

场、天意小商品批发市场治理“大城市病”问题。通过张承生态功能区建设推进京津保中心区生态建设;天津则希望通过与北京的协同达到科技创新的效果;河北则希望建立京津生态横向补偿制度,承接北京的服务业转移,与京津共同建设一批区域性技术交易市场、科技园区和创新服务平台,共同实施一批重大科技专项,共同设立一批成果转化基金,并希望能建立总部经济聚集区。京津冀三地对协同发展主要方向差别明显,产业转移中北京仅提到批发市场、医疗和教育的疏解,对环保利益补偿机制只字未提;天津希望与北京协同达到科技创新,对生态补偿机制也未提及;河北则希望承接北京服务业,建立生态横向补偿机制,同时河北规划发展总部经济也是京津两地未来重点发展的方向。总之,京津冀三地缺乏统一的规划,利益共享机制和利益表达机制缺失,尚无法有效发挥三地区协作潜力。

三、制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原因

(一) 市场经济发展仍不成熟

市场是配置资源最基础的手段,同时也是最有效率的手段。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主体是消费者、企业和政府,其中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尤其是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而京津冀三地私企数量少,制约了三地市场经济的发展。京、津、冀三省市私企占全国私企的百分比分别为4.27%、2.25%和3.18%;而上海、江苏、浙江分别占5.70%、13.81%和10.34%;广东私企占全国的10.25%^[2]。京津冀三省市企业中的国有企业比重仍较大,国有企业是靠政府扶持发展起来的,其天然的情性导致其缺乏私企的创新精神和对利益的渴望,企业缺乏活力。此外,国有企业受政府干预限制较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常束手束脚,其对生产活动和要素自由配置权受限约束。由于市场的缺陷,北京先进的技术、产业和人才迄今无法通过市场顺利向河北扩散,导致北京对周边区域的经济辐射较小。此外,京津冀民营经济落后,即使北京有技术,许多技术成果都是“导弹式转化”越过河北到“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转化^[3]。总之,京津冀私企较少,无法实现生产资源跨区域的自由配置,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无从发挥,社会福利损失较大。

(二) 政治地位不平等

京津冀三省市表面上看是京津冀三方的关系,实际上是包含了中央政府在外的“三地四方”的关系^[4]。一方面,三省市受中央统一指挥;另一方面,北京市既是一个独立行政区划的直辖市,又是中央政府所在驻地,故在中国特殊历史文化和国情下,北京集合了大量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职能,其地位明显高于津、冀

两地。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大城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其吸引资源的能力也随着加强,与周边地区形成“核心—边缘”格局,但随着大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大城市病”的出现会削弱其极化效应,促使要素资源向周边流动,实现区域内产业合理分工。北京作为首都,聚集了大量的权力资源、政策资源以及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资源,而这些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使资源配置与收入增长的机会未被公平和效率原则所支配,干扰了要素跨区域逐利机制,使要素资源流动产生固性,导致北京出现要素只进不出或只输出低级人才而留住高级人才的局面^[5]。

天津被中央政府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而北京定位主要为“政治和文化中心”。但北京一直未放弃过北方经济中心的职能,并且不断强化其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因此北京和天津在争夺北方经济中心职能时矛盾突出,利益冲突无法避免,以至于造成了北京和天津畸形竞争,产业雷同大于产业协作。此外,由于天津和北京存在利益冲突,在天津自身发展形势比较好的状况下,天津对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行动没有河北积极。京津冀一体化的关键是要解决好北京和天津现存的利益矛盾。

河北一直是京津冀三省市中的配角,政治地位低于作为直辖市的北京和天津。河北围绕京津形成的“环首都贫困带”肩负着保护首都生态环境和水资源的特殊使命,虽然贫困带的形成与自身有一定的关系,但政治因素作用不可否认。虽然河北牺牲以自身的发展为代价来支持首都发展,但是一直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补偿,而且北京还不断从河北吸引产业、科技、资本和人才资源,导致河北的发展更加困难。2014年APEC会议期间,河北停产限产企业达到8430家,停工工地5825家,前三季度全省PM2.5平均浓度下降12.7%,11个设区城市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较上年增加15天,重度以上污染减少11天;但同时河北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前三季度河北GDP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在全国排倒数第三^[6]。

(三) 中央政府的相关制度设计缺失

在目前以“GDP”作为政绩考核和“经济过失免责”的共同作用下,各地政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但大力发展自身经济,而且还动用政府权力干预本地区的经济活动,防止本区域产业、科技、人才等资源外流。对于那些能给本辖区带来GDP和税收的项目竞相采取各种政策来吸引,而对那些准备转移到外地的企业则采取种种手段予以抑制和阻止,有时甚至不惜动用行政手段干预地方经济^[7]。北京利用自身的首都优势,吸引了大量的人才、科技、产业、资本等优质资源,

但对于流出本地的优质资源往往加以限制。因此,在“GDP”和“经济过失免责”的标准下,由于京津冀市场经济不发达,所以期望京津冀地方政府实现自上而下的协同是不切实际的。此外,1994年分税制改革也使得地方政府只为自己谋利,而不会过多考虑其他地方。在现行财税体制下,一个城市想要发展就必须依靠自身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就必须依靠产业聚集,而伴随产业聚集而来的就是人口聚集,人口的聚集会带来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更高的需求,更高的需求就需要更多产业和财力支持,尤其是在现阶段地方政府财力比较紧张状况下,地方政府一方面积极引进其他区域产业,另一方面也会通过行政手段来限制本区域产业的迁出。北京市要迁出一个厂需要市委、市政府常务办公会研究通过,市长签字后方能迁出^[8]。

(四) 京津冀缺乏统一发展规划和合作制度

在京津冀现有背景下,政府是决定京津冀协同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只有京津冀政府间真正开放合作,京津冀协同才算进入实质性阶段。京津冀政府缺乏更高级别行政单位统一的发展规划,导致京津冀三省市各自定位不明确,区域之间产业雷同,容易导致区域间产业过度竞争,产生资源浪费现象,不利于资源在京津冀实现优化配置。共同规划的缺乏,也导致各地政府各自为战,无法实现现代工业发展所要求的产业链分工与产品精细化要求,不利于京津冀三省市产业结构升级。

另外,京津冀协调对话机制也不完善。地方政府定期会晤协商制度是解决地方政府矛盾、协调地方政府利益、明确地方政府未来发展方向、商讨区域性合作重大事宜以及区域问题协调的重要平台,定期举行该类会议还可以促成地方政府间有效沟通。与“长三角”地区相比,京津冀该类型的合作制度比较缺乏。自1980年代以来,“长三角”地区先后成立国务院上海经济规划办公室、“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两省一市省市长联席会议制度、沪苏浙经济发展座谈会和长江三角洲政府职能部门间联席会议、论坛,在城市间以专题形式开展交通、港口、规划、旅游、科技、信息及产权等专题合作,这些合作运作协调机制成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逐渐深入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制度保障。

四、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建议

(一) 培育市场经济主体,发挥市场激励作用

真正实现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必须依靠“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调节,“看得见的手”的政府调节只能在市场失灵时发挥辅助作用。而市场经济的主体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因此京津冀应通过鼓励民营企业发展

来促进民营经济体的壮大,真正实现市场调节机制在京津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市场经济机制的发挥,可以有效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产业同构、产业重复建设、优惠政策攀比等一系列弊端,解决北京“大城市病”、京津冀发展不均衡、京津冀区域收益远远低于区域潜力等一系列问题,实现京津冀从协同走向一体化。

当然,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壮大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在京津冀现行特殊背景下,可以其他方式的合作来实现资源配置。实践证明,“飞地经济”发展模式可以绕过行政壁垒,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实现要素资源区域内合理配置及区域合作共赢。“飞地经济”发展模式在拓展工业用地空间、实现三地要素最优配置、集约发展和产业转移及节约投资成本等方面都有非常突出的表现,是实现区域合作的有效模式^[9]。2014年11月,京津冀三地税务机关签署《税收合作框架协议》,提出协商建立“飞地”与三地共建产业园区的税收利益分享机制,协商建立区域跨省迁移企业税收政策衔接协调机制,确保企业税收政策的接续执行^[10]。京津冀现行的“飞地”主要有北京在天津宁河的北京清河农场,河北的三河、香河、大厂等。

(二) 制定京津冀发展统一规划,建立政府协商交流平台

只有建立高规格、强有力的区域协调机构,才能有效调动各地方政府力量,促进区域一体化的深入。2014年,国务院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其行政级别职能高于京津冀政府。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可以有效打破京津冀行政边界利益的格局,实现京津冀发展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协调京津冀地方政府开展工作,统筹京津冀区域合作重大事项。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但需要高规格的领导主体,还必须有统一的规划,以明确三省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定位和各自的发展方向,打破地方政府“一亩三分地”思维,通过整合区域发展资源充分释放京津冀区域发展潜力。统一的规划必须从全局出发,权衡和统筹各方利益,使三省市合作主体在区域合作中实现共赢。“规划的实施必须有法律的保障,建议探索有利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相关法律规定,包括区域规划法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土地、财政、税收、环保等相关法律和技术标准,以保证京津冀区域规划和建设的规范性、严肃性和权威性。”^[11]

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建立起完善的信息收集机制和利益表达机制。虽然京津冀地方政府也建立了类似“长三角”地区的区域合作机制,但实效并不明显。京津冀政府可以效仿“长三角”建立的四级联动体制,建立起从省长层级、常务副省长层级、市长层级到具体执行部门的协商制度,实现从宏观到微观的会商一决

策—协调—执行的四级联动,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入和各层级政府的利益^[11]。

(三) 创新发展京津冀公共服务政策和财税政策

公共服务的差距是北京对河北产生虹吸效应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从人均财政支出、全国重点高校数量,还是三甲医院的数量、社保标准等,河北与天津都存在差距,使得河北的优质资源向京津单方向流动,限制了河北省的发展,使河北成为京津冀中的一片洼地,京津冀协同难以有效深入。在京津冀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京津冀必然会面临户籍、高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难度会非常大。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正视这些问题,通过一系列创新手段和措施解决好户籍、高考、社保等矛盾,促使京津冀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京津冀协同的深入开展奠定基础。

此外,政府的“唯GDP”和“经济过失免责”原则也限制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在区域要素、产业等资源整合过程中,势必会出现某地方政府当前利益受损的局面。但从长远看,通过区域要素资源的有效配置,可以使京津冀合作潜力充分释放,实现三省市共同发展和提升整体竞争力。京津冀规划中需要提出新的政府工作评价标准,以防三省市被短期利益束缚手脚,并创新京津冀地方政府人员升迁制度,对京津冀协同工作有突出贡献的个人予以奖励性升迁,从而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步伐。京津冀协同发展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问题,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产业。因此建议建立“首都财政”,将北京从烦琐的经济发展

任务中解放出来,专职做好首都服务,也为进一步剥离经济功能和产业疏解创造条件^[12]。

[参考文献]

- [1]薄文广,周立群.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经验借鉴及对北京协同发展的启示[J].城市,2014(5).
- [2]寇大伟.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区域协调机制的视角[J].城市观察,2014(3).
- [3]赵弘.北京大城市病的治理与京津冀协同发展[J].经济管理,2014(3).
- [4]薛维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何久难推进[N].财新网,2014-4-10.
- [5]张可云,蔡之兵.京津冀协同发展历程、制约因素及未来方向[J].河北学刊,2014(6).
- [6]杨崇勇.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是政策一体化[J].经济与管理,2015(1).
- [7]薄文广,陈飞.京津冀协同发展:挑战与困境[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 [8]李博.河北正因为靠着北京才发展落后[N].21世纪经济报道,2011-11-28.
- [9]安增军,林昌辉.可持续“飞地”的基本共赢条件与战略思路——基于地方政府视角[J].华东经济管理,2008(12).
- [10]定军.京津冀合作示范区采取飞地模式税收或两地共[N].21世纪经济报道,2014-12-18.
- [11]常艳.日本首都圈的规划建设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启示[J].经济研究参考,2014(59).
- [12]赵弘.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和关键问题[J].中国流通经济,2014(12).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mong Beijing , Tianjin and Hebei: Constraints and Prospect

SUN Jiu - wen ,LI Jian - wei

(The institute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city management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 china)

Abstract: The coordinated among Beijing , Tianjin and Hebei currently has risen as a national strategy , and its gap between regional cooperation potential and developmental reality has brought about scholar 's extensive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influences on the coordinated among Beijing , Tianjin and Hebei from four aspects ,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 ,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ndition and government cooperation. Then we conclude that the key factors , which have constraints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mong Beijing , Tianjin and Hebei , are immature market economy , the political status inequality ,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system design and the lack of unified plan , and finally propose three measures , cultivating market body , unifying developmental plan , innovatively changing public service policy and fiscal policy measures.

Key Words: Jing - Jin - J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arket Body; Unified Plan

[责任编辑、校对:王月霞]